

农村教育 走自己的路

●赵家骥,本刊编辑部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673-4289(2009)05-0067-07

自“三农”问题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热议话题以来,农村教育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教育发展面临哪些困境?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农村教育的出路何在?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与农村教育专家赵家骥教授展开了对话。

——编者

本刊:您从大学毕业开始就扎根在农村教育这块土地,算来快有半个世纪了,可以说您是这50年来农村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请根据您的研究谈谈您对当今农村教育的体验和感受吧。

赵家骥:准确地说,几十年来我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但不全是农村教育。开始我在大学任教,后来在党政机关分管教育工作,再往后就致力于农村教育的实践与研究。我热爱农村教育,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特别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情况。改革开放以前,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单以办学条件来说,就十分简陋,农村学校到处有危房,每逢刮风下雨,学校随时可能发生跨塌。当时在县级教育局局长中流传一种说法:“教育局长的两只脚,有一只是在监狱里面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基本实现“校校无危房”,二是基本扫除了青壮年中的文盲,三是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是改革开放的硕果,也是历史的丰碑。

本刊:农村教育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为什么社会对改革农村教育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政府也越来越强调农村教育的发展?

赵家骥:农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对农村教育改革的呼声却越来越高,这看似一个悖论,事实上,我认为这是农村教育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必然结果。在我国,农村教育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

地位,具体表现在:一是投入严重不足,难以正常运行;二是基本办学条件太差,校点分散,校舍陈旧甚至破烂,到处有四面透风的“四川(穿)”教室;三是教师队伍素质较差,民办和代课教师是农村教育的主力军;四是教师待遇低且不落实,教师队伍不稳定;五是中等师范学校取消,乡村教师渠道不畅;六是农村教育一味克隆城市教育,与经济发展、社会需要严重脱节。农村经济的发展缓慢和农村教育落后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的低效导致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偏低,成为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为此,解决突出的“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发展和改革农村教育,通过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培训方式来教育农民,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本刊:您既是农村教育的研究者,同时也担任过多年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一把手”工作,您认为农村教育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赵家骥:就我个人的看法,当前教育公平问题和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是最值得关注的两大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反映在农村教育上体现为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农村教育公平一方面要依靠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社会各方面包括城市的广泛支持。而农村教育的发展是关键,关系到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其中既

当前教育公平问题和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是最值得关注的两大问题

有大力发展的问題,又有怎样发展的问題,既需要政府的导向,又需要教育部门自身的努力。总之,这两大问題涉及的具体问題很多。从实践上讲,包括农村办学条件改善、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农村教育办学特色、农村教育模式构建、农村学校管理素质以及农村教育改革等问題。从理论上讲,又涵盖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农村办学模式的探索选择以及对“以人为本”的认识等尚未明晰的内容。国家发展研究中心近几年反复强调“三农”是重中之重。那么,农村的重中之重又是什么呢?依我之见,农村的重中之重就是农村教育。

本刊:请您具体谈谈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題。

赵家驥: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表现形式很多,首先是财政投入不足导致的起点不公平、地区不公平和个人不公平等诸多问題。

从学历人口看差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村低学历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其中小学程度以下和初中所占比例分别是城市的3.2倍和1.28倍,而城市人口中高学历比例则明显高于农村,其中研究生比例是农村的323倍、本科281.55倍、大专55.5倍、中专16.5倍、高中3.5倍。当然,上面数据中含有不可比因素。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差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从生均经费看差距:近年来成都市大力投资农村教育。尽管如此,成都市生均经费的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如2003年6城区小学生均经费为2991.56元,初中生为4523.27元;14郊县小学生均经费为1430.96元,初中为2091.51元,郊县仅为城区的46%左右。成都市生均经费城乡差异尚且如此明显,其他地方就更难想象了。

从教师学历情况看差距: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差距反映在教师学历上。以2004年成都市教师学历为例,高中中专:城区为2.5%,城郊为8.0%、重点镇中为4.5%;大专:城区15.5%,城郊为46.2%,重点镇中为47.0%;本科:城区81.4%,城郊45.6%,重点镇中为48.5%

从教师职称情况看差距:城乡差距还体现在教师职称情况上。据调查,2004年成都市高级

职称比例城区为20.7%,城郊为11.3%,重点镇中仅为7.5%;初级职称比例城区为32.0%,城郊为44.1%,重点镇中为50.8%。由此可知,本科学历比例城市比农村高35.8%,高级职称比例城市学校是郊区学校的2倍,重点镇中的3倍。

从城乡收入看差距:从1978年到2004年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90元上升到7000多元,相对收入差距已超过了3.2倍。另外,城市居民绝大多数有社会保障,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现在才开始提上日程;城市居民享有道路、医疗、服务等公共设施,而农村居民却相对缺乏。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比至少为10:1。由此看来,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十分明显。

本刊:面对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您觉得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赵家驥: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由普及转变为提高,由以数量为主转变为以质量为主,这里不再赘述。第二个变化是从城乡教育的二元发展转变为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这个问题理论界尚少涉及,我们主要就此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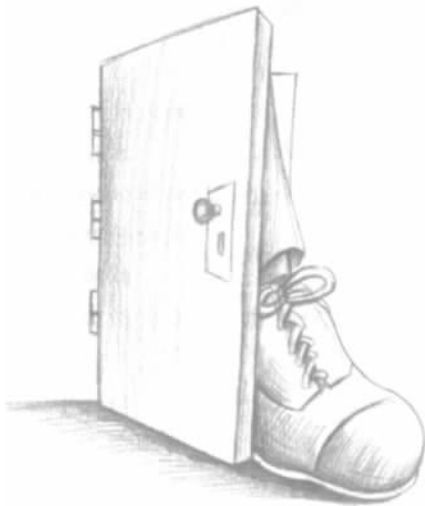
思考。过去,我们都强调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来推动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现在却要求以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思路来统筹城乡教育的发展。这就是说,当前的举措关键有两条:一是政府真正把农村教育当成重中之

重,“以父母之心办教育”,切实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二是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以城市教育带动乡村教育,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从历史进程看,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为此,今后的发展战略到底是要让农民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做贡献,还是应该让工业和城市的经济更多地带动农村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明显。要深化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就必须坚持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本刊:如何实施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赵家驥:城乡教育一体化,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为城乡居民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实现教育公平。但公平并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根据一定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公平度,在保护合理的

以城市教育带动乡村教育,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社会激励机制和建立和谐社会之间找到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既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又有利于激励城乡教育改革发展和互补互促。公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特定条件下,平均是公平,认同也是公平。但是我们追求的绝不是平均,也不是认同,而是机会与条件的公平。实施城乡教育一体化,一是必须打破“农村教育农村管”的思维局限,坚持“四个必须”,即必须统一制定具备平等条件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规划,必须明确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和责任,必须制定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和保障措施,必须对城乡教育实行统一规划与分类指导。二是需要制定和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及有关条例。在现代化建设中,农村和城市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支持的。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为城市提供资金积累,当城市化得到发展之后,我们就必须及时调整思路,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市带动农村”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实现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提出的“以工促农,以城市带动农村”的总体构想。为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探索城乡教育互补互促、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本刊:自2001年起,我国逐步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对这样的管理体制改革,您是如何看待的?这对推进农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有何意义?

赵家骥:“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在义务教育普及阶段是立了大功的,进一步明确这种体制,对加强县级部门对教育的统筹协调有好处,也有利于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但是,这种管理体制也存在很多弊端,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一是“以县为主”没有办法做到公平。为此,必须明确“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的内涵,即管理体制就是管理体制,不应当包括投资体制的内容。据调查,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县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财政多数也是“吃饭”财政,农村教师的工资福利由这样的穷财政来负担,常常得不到保障,这是农村教育潜伏的一个巨大的危机。二是“以县为主”无法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为此,必须看到我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新变化。农村教育改革像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大大地改变了农村教育的面貌,促进了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但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否能适应时代需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病,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强调农村教育自然也涉及到强调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关注的人很多,议论的人也很多。但就目前的讨论而言,基本上还处在混沌不清的状态,甚至于对什么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多数人的概念都还比较模糊。为此,概念的厘清,显得十分必要。可以肯定地说,多数地方县级农村职业与技术教育是十分薄弱的,职教中心满足不了新农村建设对职业与技术教育的要求的。

在我看来,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很简单。县不过是农村的龙头,它只能在农村本身的资源上搞协调、搞平衡,在协调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上通常无能为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县的层面上,这样的视野太过狭窄,难以实现城乡统筹。为此,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拓宽思路,充分发挥省、市两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的功能。说到这里,我的建议有两个要点:第一是财政保障。具体说,就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办学经费由国家全包,教师的工资福利也应该以中央财政为主,这是稳定提高农村教师最根本的举措,也是农村教育得以正常发展的根本保证。第二是加大中央、省、市对农村教育的统筹力度。着力加强以城带乡、城乡联动的发展战略,整体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本刊:您一开始谈到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教育公平,另外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您从国家政策的保障和

农村教育外部环境、条件的优化方面谈了一些解决思路,相信对走好农村教育发展之路有所启迪。请就农村教育本身的发展问题谈谈看法。

赵家骥:由于不适应农村的发展变化和教育本身的改革需要,农村教育发展目前出现了内外交困的困境。

首先,与外部不和谐。农村发展过去主要依靠农业的发展,现在则主要依靠二、三产业的共同繁荣。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和集约化经营,使得人们对从事农业生产者的素质要求相应提高。为此,构建协调和谐的农村教育结构体系,必须与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只有具备这种特征的教育结构,才能实现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发展与人以及教育体系内部诸要素共同发展的协调和谐。农村教育结构体系包括层次结构、专业结构、类型结构和布局结构四个结构要素。目前,构建该结构体系的要素主要出现了以下问题:一是层次结构体系不能适应教育发展需要,高中阶段的发展尤其滞后;二是专业结构体系不能适应新农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新局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应充分发挥省、市两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功能

面;三是类型结构体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教育形式单一;四是布局结构体系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更不利于农村教育的长期发展。基于上述弊端,我认为,当前的农村教育结构体系亟待改革,应该尽快建立起适应全面小康的农村教育结构模式,而这种高效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结构模式,在现阶段的农村教育中是很难实现的。

第二,内部不和谐。这种内部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中阶段教育成为公平与和谐的焦点,问题突出反映在弱势群体出高价、优势群体出平价,中学教育资源配置的城市中心取向日趋突出,高中教育的发展滞后几个方面。现存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教育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累积和延续,高中教育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最为狭窄的瓶颈。二是“重点学校制度”引发的教育不公平因素。在我国,重点学校制度作为一种选拔甄别人才的一种教育制度,在某一阶段曾经为教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重点学校基本上集中在繁华的城市或发达的经济区,很少进入乡村,因此,实际上这种制度也是一种趋向城市忽略农村的不公平制度。如今,重点学校制度已经成为扩大差距,并逐渐成为一种复制和扩大这种差距的制度。很多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豪华的名牌学校、重点学校既是地方政府的政绩,也可以满足优势阶层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的说法。为此,研究不同家庭子女进入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的途径,成为了当前许多教育研究者考察教育是否公平的重要视角。

鉴于农村教育内外不和谐现状,我们必须提出第三点,即农村教育必须改革的问题。在我看来,农村教育的内外不和谐问题,不能只靠扶持来解决,而要下定决心改革发展。为此,一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素质全面发展为本。素质教育喊了多年,为什么农村学生缺少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课改进行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们的农村教育还是把“学”和“生”分开讨论?讲素质就应当讲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如果连生存和生活都成为问题,又怎么谈创造和发展呢?二要从县域发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当前的农村教育普遍存在着升学率高与人民群众相对比较穷的现象,这是不是违背了“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初衷?岂不违背了以教育成果惠及人民的目标吗?三要农村教育要走特色教育之路。现在的农村中小学有特色

的不多,基本上是克隆城市教育模式。农村学校为什么就不能创造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办学模式呢?这是一个值得反复审视的问题。在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我认为,应当学习宣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陶行知说,“学的意义,是生活或是生存。学生所学的是人生之道”,“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生,要很好地生活或是生存就要学”,“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四是传统意识使农民对职技教育认识不足,需求不强,普遍存在短视、盲目、狭隘的特征,再加上过去教育供给的失误,使农民的教育需求严重受挫。为此,在农村教育改革中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

本刊: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您有什么认识和建议?

赵家驥:在我国,不知道是不是存在“研究农村教育会掉价”的认识,长期以来研究农村教育的队伍始终很小,社会对农村教育关注始终不够。有些人把农村教育问题看得很简单,似乎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认为只要改变农村教育长期的弱势地位,其他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事实上,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农村教育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领域,

较之城市教育要复杂得多,而现在的农村教育基本上是简单地克隆城市教育的内容和模式,不能算完全意义的农村需要的教育。真实的农村教育,应当既包括普通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还包括内容广阔、形式多样、层次复杂的各级各类的教育,应当既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又涵盖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研究和解决农村教育问题,不仅需要包括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还需要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政治学等方面学科知识的强大支撑。为此,农村教育这样一个综合课题,单凭一己之力是很难实现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令人兴奋的是,近年来在高等学校研究农村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如东北师大、北师大、西南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农村教育研究所和农村教育博士点对农村教育改革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尽管如此,就发展需求而言,这样的专业人员还是为数太少,远远不能适应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在这里,我真切地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更为实在地关心农村教育,建立以高校和农村教育实践家联合牵头的强大的农村教育研究队伍,长期扎根农村基层,扎扎实实地解决农村教育的实践问题。搞农村教育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决不能做

要解决内外不和谐现状,农村教育不能只靠扶持,还必须下决心改革

远离农村教育实践,搞缺乏实证的“田野研究”,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跳不出传统教育研究的狭隘视角。我坚决反对搞虚假的农村教育研究,反对以农村教育做秀的浮躁心态和喧嚣之气。

本刊:在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上,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赵家骥:就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而言,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及成功经验。但区别于其他国家,我国是世界上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农村量大面宽,农村人口庞大,农村教育形势严峻但具有跨越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因此,我国农村教育要改革要发展,不能照搬别人的东西,必须合理布局,优化结构,走自己的路,构建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不是要刻意地制造什么模式,而是要在实践中去总结去提炼,把那些成功的,实践有效的典型案例,转化为具有一般特征的模式。比如,在西部地区最早走向世界的“短平快”模式和在国内很有影响的“宽实活”模式,就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四川特色。就“短平快”说吧,当初也没有想到创造什么模式,是根据农村和农民的要求去改革,在改革中自然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后来是张文焕同志在联合国亚太地区大众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让人折服,被当时的总干事说概括为“发展中国家的模式”,这才不胫而走流行开来的。近年来,农村学校有着许多探索和创造,也不乏成功的典型。四川就有不少好的经验和创造。我觉得要走自己的路,就要构建自己的模式,就要多总结和宣传土生土长的经验。

本刊:您认为30年来,四川农村教育改革发展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经验?

赵家骥:四川,准确地说是川渝地区的农村教育研究在国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农村教育是四川教育的一大优势,具体情况如下:

1984年四川省率先成立农村教育研究会,次年探索建立学校教科室,这对大面积提高城乡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1985年由教育厅副厅长向国灵牵头的《农村教育整体改革与发展研究》被正式列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滚动计划重点课题;1986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2省区现场会在乐山召开,大会充分肯定了四川发展乡镇成人教育的经验,并推行乐山实际、实用、实效的实用技术培训;1987年7月省教育厅张文焕处长在“亚太地区大众教育”研讨会上介绍四川“短平快”成人教育经验,同年乐山“以县为主

体,乡为基础,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在山东“平度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1990年10月全国第二次“燎原计划”与农村教育改革实验工作会议在四川温江召开,温江的专业户家庭技术学校成为亮点;1995年全国农村初中建设研讨会在四川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川渝地区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1996年全国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学校艺术教育工作会议以温江县为现场召开,四川的“宽实活”职技教育模式和为解决农村民办教师问题的“关、转、招、辞、退”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97年5月31日原乐山市承担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研究”重大课题《构建农村大教育——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正式通过专家鉴定,被评为“国内领先水平”;2002年温江县和重庆渝北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经验得到教育部认可;2003年温江教育局汪仲汉、青神县南城成教中心校长陈云华在全国成人教育骨干培训班上做报告;2004年四川成都率先提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并实施农村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2006年4月,教育部主持的教育均衡发展

工作会议以成都为典型召开,四川省率先提出“城乡教育一体化——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必由之路”的命题,同年11月,全国“新农村建设与教育”研讨会在眉山召开,青神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被誉为“留守儿童工作的青神模式”,之后

在全国得以广泛推广;2007年眉山市南城成人教育中心“职业教育与经济相结合,技术学校与产业相结合,办一方教育,富裕一方人民”的办学经验得到国家领导的高度评价;2009年该中心被挂牌“国际竹藤网络培训基地”。此外,关于新农村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温江模式,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113”模式及成都龙泉驿区实施的创造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经验,都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还有许多创造性经验。

本刊:您如何看待农村教育改革中的教师队伍建设?

赵家骥:伴随“两基”攻坚计划、“两免一补”等相关政策的落实,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村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学生入学率明显提高,农民负担得到减轻。尽管如此,当前制约农村教育发展和农村教育质量提高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发展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和第一推动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

农村教育必须走自己的路,构建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我国教育发展必须重视的核心问题。我认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可以从三方面来着手进行:一是落实老师的地位和待遇。主要以提高教师社会经济地位为核心,建立农村教师工资福利长效保障机制,将教师工资从“以县为主”过渡到“以中央为主”,确保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建立教师特殊津贴制度,完善教师的福利制度。二是加强教师队伍管理制度。建立规范的教师编制与人事改革制度,建立高效的农村教师培训机制,形成新的城镇教师支教与大学生支教相结合的支教制度。三是加快农村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进程。为此,一方面应当更新中小学教师的教育观念,提升教师专业学历层次,提高教师的教育技术专业水平,教师职称评定向艰苦的地区倾斜。另一方面要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校本教研制度,扎扎实实搞好教师培训工作,采取骨干教师培训和后进教师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在这个方面,四川又有不少成功经验,比如,以总课题带子课题,大课题带小课题。学校应大力开展校本小课题研究,使教师参与面尽量扩大,通过这一途径,教师会个个有收获,人人有提高。绵阳市游仙区石板小学就是立足校本抓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成长迅速,人才辈出的好典型。

发展农村教育,
追求教育公平,
必须解决好农村
留守儿童问题

本刊:您在谈话中提到进城务工人员女问题和留守儿童的问题,但有的人认为,留守儿童只不过是少数人的事情,教育是不是管得宽了一点,您能不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赵家骥:我认为,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作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新鲜事物”,不仅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且是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较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关注和面对的问题,更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和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无后劲的大问题。为此,教育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广泛关注,不是管得太多,而是应当管,必须管。按照联合国的定义,1-18岁都称为儿童。应当明确,教育要管的是留守学生,即进入学校的这部分。

首先,留守儿童是伴随全面建设小康新形势过程中在农村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量与日俱增,在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中便产生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最大区别在于留守儿童因与父母长期分离,亲情缺失,身心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如果

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将会对儿童健康成长带来严重后果:一是幼小的孩子与父母长期分离,缺少亲情关爱,容易导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二是监护不力,会导致部分儿童受到监护人漠视;三是正在成长中的孩子,由于缺乏学习和生活的指导,学习行为和思想道德问题比较多;四是留守儿童中的大部分孩子,年纪比较小,还不太懂事,容易受周边环境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五是由于学校承担的责任过重以及缺少有效的科学管理机制,严重制约了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管理。正在成长发育中的农村留守儿童,成为新时期农村有着特殊问题的特殊群体,需要特殊的关注、教育和保护。

第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比较长时间都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有的人认为留守儿童问题过些日子就自行消失了,也有人认为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回来就能解决问题了。其实,这些认识都是对当今时代背景认识不够而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产生,又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的新的社会现象。有的

领导者说:“做好工作,让进城务工的人逐步回流,问题就解决了”。对此,我曾经说了一个笑话:“如果进城务工的人都回流了,北京“鸟巢”就没有人修了。”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也是现代化发展进步的结果,它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非到工业化完全实现,这种现象不会完全消失。

第三,留守儿童问题是关系社会和谐的大问题。我曾经参加过国务院和省教育厅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因此深有感触。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守父亲或母亲家务活或生活压力大,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也有夫妻双双外出打工,把年幼的孩子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一般而言,祖孙之间年龄相差大,加之大多数农村老人文化偏低,所以对于孙子辈的教育只能做到照料生活起居,而对孩子的学业指导、心理健康指导等大部分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在发育成长中的孩子普遍存在三缺:生活缺人照顾,行为缺人管教、学习缺人辅导。这样的状况导致不少农村儿童生活失助、学业失教、行为失控、道德失范,心理失衡而成为“问题少年”,有的甚至误入歧途,走上邪路。由此,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已成为关乎社会稳定、关系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留守儿童受伤害案件成为农村社会治安中新的突出问题。

正在发育成长中的孩子普遍存在三缺:生活缺人照顾,行为缺人管教、学习缺人辅导。这样的状况导致不少农村儿童生活失助、学业失教、行为失控、道德失范,心理失衡而成为“问题少年”,有的甚至误入歧途,走上邪路。由此,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已成为关乎社会稳定、关系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留守儿童受伤害案件成为农村社会治安中新的突出问题。

第四,世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留守儿童问题同样是一个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劲的大问题,以英国和爱尔兰为例。英国是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一度是世界经济强国。1850年前后曾有大量的劳动者从英国乡村涌入城市,但由于政府没有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为这些工人的子女提供相应的教育,到十九世纪末,英国对电力、冶金和化学等技术的掌握已经远远落后于重视对教育进行投资的德国,进入二十世纪,英国更是因无法保持住技术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优势而逐渐落伍。与此相反,爱尔兰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时,是欧洲最穷的农业国之

一。由于该国政府十分重视留守儿童教育工作,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带来科技的突飞猛进。结果,爱尔兰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欧洲最穷的国家到最富的国家的巨大转变。

本刊:谢谢赵教授,您就农村教育发展的为题谈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相信这些对于人们了解农村教育,研究农村教育和参与农村教育改革有切实的启迪。

(作者单位:乐山市教育局,四川,乐山 614000)

编者视角

基于研究者的良知、正义和精神诉求,赵家骥教授通过对话坦率而负责任地为我们掀开一扇透视农村教育现实图景的窗口。我们看到,发展中的农村教育步履蹒跚之姿,奋力拼搏之态。农村教育,现实与理想错位,困境与希望同存,发展农村教育,究竟路在何方?赵家骥教授基于现状分析和未来思考,为我们勾勒出一条突围困境的农村教育发展之路。

纵向看,农村教育变化喜人,横向看,农村教育发展缓慢。针对城乡二元结构,他强调通过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之路,破解农村教育“发展”与“公平”这互为因果的难题。

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之路,首先需要优化农村教育生态环境。他主张改善“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打破“农村教育农村管”的思维局限,提出为农村教育发展建立财政保障,加大中央、省、市对农村教育的统筹力度,着力加强以城带乡,城乡联动的发展战略,整体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之路,关键是寻求适应农村教育的发展之路。针对农村教育内外矛盾交织,针对重点学校制度继续引发教育不公平的问题,赵家骥教授提出:农村教育,不能克隆城市教育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农村教育的发展自有规律与特点,但适应农村教育发展的先进思想与理念如何才能不被城市教育模式所湮没?赵家骥教授认为,一方面,需要加强对陶行知的农村教育思想的宣传、学习与研究,另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有志者加盟农村教育发展的行动研究,并通过借鉴已有的农村教育改革经验,结合新的教育发展形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构建切实可行、特色鲜明的能与城市教育发展同步比肩的生态式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教育一体化”。

农村教育的公平与发展,关乎国计民生。农村教育如何为此而走稳、走好自己的路,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花大力气破解的难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本刊欢迎同仁就此展开多角度、多视角的讨论与对话。

(栏目责任编辑 陈 涵 dhlm66@163.com)